

博雅集

萧超然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博雅集

萧超然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雅集 / 萧超然著. -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77-0091-4

I. ①博… II. ①萧…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5874号

博 雅 集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号楼303室

邮 编: 100010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6525175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网 址: www.bjd.com.cn/txcbs/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0千字

定 价: 28.00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言

王诒来

我与超然是 65 年的老朋友了。我们相识是在 1946 年秋刚进高中读书的时候。从那时至今的 65 年当中,我们一直交往,从未间断,始终互相关心,可谓是真正的知交莫逆。我现在总结我们的友谊时,总认为:超然是将进步思想传给我的第一人。我们在国师附中(即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书时,他有几个在国师读书的同乡,是进步的大学生。1949 年到来后,他从那些大学生处得到一些解放战争胜利进展的信息,并接触到某些进步书籍。他又把这些传给我,于是我俩才酝酿在附中成立进步的中学生社团。1949 年 5 月间,他离校去了长沙,考取了北京大学。他就给我来信,催我也快去长沙,说在那里无论参加工作或参加南下工作团都有机会。这样,我才在白崇禧部队搜查国师附中并逮捕了一些同学之后,与几个漏网的同学一起奔往已解放了的长沙。我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描写我快到长沙时的心情说:“长沙在望望京华。”就是向往北京呀,也即向往解放、向往进步、向往新中国。我与超然,当时不过是这股奔向新中国的大潮中的两滴水而已。

去年,我读到一本叫做《大海大江》的书,其中写到某学校的校长带着学生,跟着国民党的残兵奔逃,企图前往台湾。如:有“8所山东中学的8000个学生,从1948年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1949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5000多人。……为了让5000个学生能够离开广州到安全的台湾,校长们和军方达成协议:学生准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17岁以上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等等(见该书第104页)。此类的描写,还有一些。听说有人认为此书写得好,而台湾的李敖则说这书是骗人。我的意见是,希望读过这本书的人不要忘记:当时还有我在上面提到的那股潮流,即向往解放、向往进步、向往新中国的潮流,简直是洪流,要比这大得多。

超然在1949年秋就到了北京,进北大读书,而我也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夕参军去了东北。1954年秋,我考取北大,来京就学,才得再与超然相会。这时超然已是一个年轻的教师,而我还是一个大一的学生。虽不属于一个层次,但旧识终归胜过新交,我们之间并未因此疏远,反而密切有加。超然毕生研究党史和北大的历史;我在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去新疆从事西域历史的研究工作,达25年之久。1984年,我调回家乡长沙教书,以后也没有放弃原来的研究,故我俩的专业可谓殊科。这也不妨碍我们精神上的相通,而互相激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60多年中,我俩虽然工作不在一地,如同参商,但从未断过联系。现在,看到超然在此书中的这些文章和诗作,真是倍感亲切。

我与超然一同度过了这 60 多年的岁月,经历了同龄人一样的喜乐悲苦,都像苏东坡所希望的那样“无灾无难”地过来了,但并没有成为“公卿”。不过超然比我还是要好得多。这当中的原因,要归之于他的为人。他宅心宽厚,诚恳待人,总是与人为善。特别是有两点:他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协和群众。如果不能坚持原则,就会犯错误;如果不能与群众搞好关系,就会遭到群众的反对。二者缺一不可。由于他有这两个优点,以至于他在“文革”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特殊年代,都安然地过来了。他又不善于钻营,所以升不了官。而我呢,不要说升官,即使想要当官也不可得。但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一定要升官呢?到了我们这样耄耋之年,看世事、经世变多了,反而会觉得,哪怕做到了“公卿”身份,也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2008 年,我们在国师附中时的同学在京聚会,我因故未去。我们同级的同学沈志芸院士对此次聚会甚为满意,很有感慨。志芸过后对我说:要过好晚年须得有三个老,即老伴、老友和老本。我认为超然可说是三老都具备了,首先是他有一个好老伴。他的老伴陆彬良,不但在生活上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以至他在耄耋高年之时仍然身体健康;还有就是在他事业的成就方面,彬良也多有贡献与帮助。正如超然在此书后记中说的:在此书的“成书过程中,老伴陆彬良倾注了心血,删除了衍文,改正了错别字等,是我俩老夫妻切磋合作而成”。至于老本,这在超然是足够的,不用我说。老友嘛,我真以能作为他的一个老友为荣,希望我不会辱没了他。

读了超然的这本书,我也有一点感想。我认为,这书也是他在写自己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有的人写起来心安理得,下笔如行云流水;有的人则懊恨交集,难于下笔,以至根本写不出来。这说明,一个人的历史,就好像一个学生平日做作业。人们平常的一言一行都是在写自己的历史。平日做了什么,将来你就只能写什么。超然在此书中写的这些史事,反映了他一生的业绩,是不负于这个时代的。我们只有时时刻刻想着人民、想着国家,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效力,我们才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国家、无愧于自己的时代。超然已无愧于自己的一切、自己的党。我现在也在学习他的为人行事,希望也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故敢题拙诗四句,以与超然兄共勉。

八十余年瞬息过,
抚今追昔又如何?
一生只望邦家盛,
耄耋欣闻奋进歌。

2011年5月4日,于长沙橘子洲畔。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亚史专家)

作者教学与学术思想述要

宋月红

巍巍上庠之北大，百年星辰璀璨。我国著名学者、中共党史专家萧超然先生，从新中国诞生之初就开始在这里求学、执教和治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辛勤耕耘于历史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领域，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政党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积极倡导和发展以北大校史研究为基点的五四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等专门性研究，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中，先后以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之职，参与主持并开创性地推进了北大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体系的发展建设，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批莘莘学子，在国内外久负盛誉。

一、执教育人，治学求索

萧先生195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本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专业研究生毕业。毕业时，正值新中国百业正兴，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形势和建设人才相当匮乏的局面，他选择以教书育人为职，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北大这片培育了五四精神的沃土。

传播、学习、讲授、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北大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教育和思想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说，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萧先生早年在北大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这两大支柱性公共课

程，孜孜不倦地向青年学生宣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他还经常深入机关和厂矿企业，在干部职工中普及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育，从此也奠定了他致力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人生轨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萧先生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拨乱反正工作，以其对党史的科学研究成果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资政育人，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参加了讨论。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正是在他的具体主持下，肩负起了新时期北大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和学科建设的任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和引导青年，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青年。一批批青年学生从这里走向社会和各行各业，一批批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问世，一些富有特色的专门研究领域，尤其是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校史的课题研究群，逐步产生、确立并发展起来。

注重运用北大史实、史迹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是萧先生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由此开垦出以研究北大和北大人为主要对象的“北京大学”这一融历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为一体的学科分支。他研究北京大学校史始于1978年，开篇之作是为纪念北大建校80周年而作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北京大学的革命战斗历程》。在此后从未间断的研究实践中，他逐步形成把北大校史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1994年11月，萧超然教授向学生介绍北大图书馆旧址。

的思想，并确立了研究北大校史的方向。如关于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以及李大钊、蔡元培、青年毛泽东、邓中夏等五四历史人物研究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他研究五四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因而也倍加关心青年人的成

长。为此，在教学之余，他还经常到北大红楼旧址缅怀五四历史、宣讲五四精神，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五四时期，红楼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办公处和北方区委机关报的印刷处，被派往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内蒙古等地建立党组织的代表也是从这里踏上征程的。而民主广场这一革命战斗遗址，则是解放战争时期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争民主等多次学生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和学生队伍的集合地。萧先生从它们的教育和纪念意义出发，曾多次建议将红楼建设为革命青年运动博物馆，并恢复民主广场的历史原貌，使之成为永久性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这是一位学者的革命情怀，是一位长者对青年的希望和重托。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顺应我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的形势与任务，萧先生毅然放下自己手头的研究工作，担负起筹备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历史重任。随后，他作为恢复和重建后的北大政治学系第一任系主任，在继续推进中共党史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心血和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了筹划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建设中。如今，北大所拥有的政治学、行政学的发展基础和领先地位，就是在那时初步奠立的。也就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萧先生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实现了中共党史学与政治学的有机结合，并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初创，作出了多方面积极而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萧先生从1982年起开始招收中国革命史专业、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0多年间先后培养了30多名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他们大都已成为本专业或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教学骨干，有的还走上了实际工作的领导岗位。1994年，经北京大学申请、教育部特批，萧先生作为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他在中国政治学界为博士生首开中国政党与政治研究方向的课程，先后培养了6位国内博士生和两位来自韩国的博士留学生，并受邀指导了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两位博士留学生撰写学位论文。

萧先生还长期担任中国蔡元培研究会总干事、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理事，中国斯诺研究中心委员等职。曾应邀赴美国、朝鲜等有关国家与香港地区访问、讲学，并被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Santa Barbara）聘为客座教授。



1997年中秋，萧超然教授夫妇与韩国博士生李正男（左一）、李南周（右一）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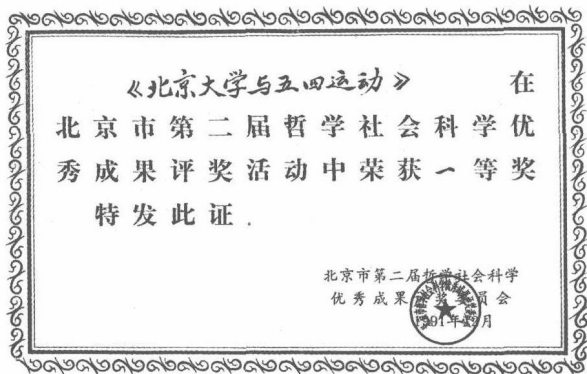
2002年8月5日，萧超然教授与魏定熙（左一，美国博士生）、金安平（右一，北大硕士生）在蓝旗营寓所合影。

二、笔耕不辍，著述丰厚

萧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教生涯中，以教学促研究，又以研究促教学，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

（一）《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1995年重印）。

萧先生从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角度研究五四时期的中国历史，揭示了北京大学从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发展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进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中心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北方基地的历史进程。1991年，该著作荣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二）《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增订版）。

该书是由萧先生主持编写和定稿的北大通史著述，它记述了北京大学从戊戌变法运动中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开了将北大校史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全程结合进行研究的先河。

（三）《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主编、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从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的角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确立、完善的历史进程，以及这一制度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深入总结了100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

(四)《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文章是萧先生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而作的。他通过历史文献释读、史物与史实考订及实证分析,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的社会历史特征和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此文是作者对其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与五四新文化思想史、北京大学校史等多领域研究的集成和再研究。

(五)《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论文,《百年潮》2001年第7期)。

萧先生以珍贵可信的史料和严密的推理,基本坐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历史“悬案”。他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真实可信的,陈独秀是和李大钊一起最早提出和发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共早期领导者,其建党创始之功是不能抹杀的。由此,他指出,从中国共产党由成立到成熟的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应该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

(六)《试论蔡元培先生的“和而不同”精神》(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萧先生认为,蔡元培一生最为鲜明、最可钦敬的特色,就是为推动进步和发展学术所具有的“和而不同”的精神。这种精神固然完整体现在蔡元培一生的言行中,但“和”的精神是主要的。这种“和”的精神有一种泛爱的色彩,包含着深广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内容,是他的思想中主要、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他认定“中庸”、“中和”是中国民族固有之德性。因此,尽管蔡元培首倡平民教育,支持工读互助,鼓吹劳工神圣,同情劳苦大众,容许马克思主义,表现了他的“和”的精神;但同时他反对工农大众以革命手段改变旧的统治秩序,也表现了他的“不同”。他的“和而不同”精神也反映在他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处理中。他赞同国共两党合作,尽管发生过1927年后一段短时间的迷误,

但这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言行。他一贯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同情共产主义者与劳苦大众。他对共产党人是宽容、友好和爱护的。因此从其思想本质看，他是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盟友。

此外，萧先生的著述还有：《中国革命史稿》（主编、合著）、《国民革命的兴起》（主编）、《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主编、合著）、《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主编、合著）、《中共党史简明词典》（第一主编）、《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主编），学术论文及译作一百余篇。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发端。萧先生也是从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而不断深入和拓展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的，遵循和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具体统一。

（一）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为爱国政治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萧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学生政治运动，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运动。以拒签和约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学生政治运动，是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针对五四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启蒙被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政治发展所打断、所代替，是革命压倒了启蒙，政治干扰了文化等观点，他认为，中国近现代发展的首要主题是民族独立，是救亡，也是民主的诉求；是政治，也是文化。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空前觉醒，从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五四运动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开始发展，逐渐取代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居于文化“盟长”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视角，开启了中国人民之蒙，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统一的现实道路，并把一个均富、民主、文明、幸福的社会主义远景，呈现于全国人民面前。这是最根本的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为爱国政治运动，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关于“五四精神”

萧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界说“五四精神”，应从“五四”价值的政治取向和思想取向来分析。从政治取向看，“五四精神”侧重于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从文化思想取向看，则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但不论狭义或是广义理解，爱国主义无疑是五四运动的一面鲜艳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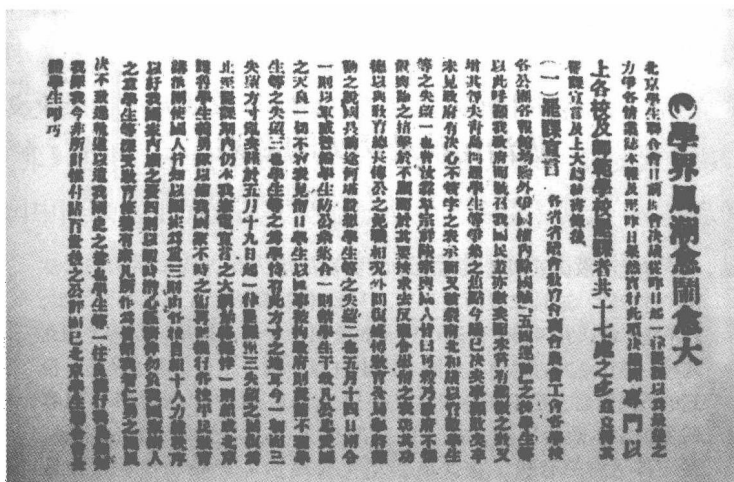
他还认为，五四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次青年运动。但在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翼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不一样，后来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以共产主义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五四”青年是五四运动的中坚，是“五四”时期一代青年的卓越代表，具有解放思想、寻求真理、反对旧传统旧教条的精神，忧国忧民、救国救民、公而忘私的精神和踏实勤谨、向工农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就是“五四”青年的革命精神。

（三）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五四’时期起点”

在中国文化教育发展问题上，那种认为中国近代是革命压制了启蒙，是革命造成了破坏和不安定，导致了今天文化教育的落后的观点在一段时间曾颇有市场。萧先生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五四”时期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举起暴力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的旗帜，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这正是发展新的民族文化、普及国民教育的根本前提。而且革命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对各种奴化思想、封建宗法思想的破除，本身就是一次极大的启蒙，一次活生生的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启发了人民对封建主义的认识，也使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这也是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前提。因此，认真地说，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是从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四) 关于“五四运动”概念的史源

“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在1919年5月26日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第23期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被奉为学术定论。萧先生以史家之精神寻根溯源,经过艰辛考证发现,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为抗议北京军阀政府的镇压和阴谋在“和约”上签字而举行全体北京学生总罢课,并于5月18日发布《罢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将5月4日的爱国游行示威第一次称为“五四运动”。这一《宣言》刊登在1919年5月20日《晨报》上,比同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3期早了6天。他认为,根据现有史料,“五四运动”一词应始见于此。



《罢课宣言》最早刊载于1919年5月20日《晨报》第2版。《宣言》发布于“巧”日。巧日在《韵目代日表》中为18日。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教育史研究

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第一家、第一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最重要的一个源头。这是因为当时的北大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精神,又有一大批怀有强烈求索

意识的爱国先进知识分子。作为当时一种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必须经过知识分子才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正是借助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强劲势头，迅速播扬于全国。北大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中心。

(一) 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刊发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也是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为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引向深入，从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北京大学学生积极分子和领袖人物，在李大钊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秘密酝酿，于1920年3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在北大以至全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共产党支部为了征集会员，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决定把这个“研究会”在北大校内完全公开，并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启事》。这则《启事》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扎根北大的情况，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萧先生向季羨林先生请教亢慕义斋珍藏的德文版文献书籍的中文译名。